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唐人街/高建平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思想者丛书)

ISBN 7-5059-3538-0

I. 走…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897 号

书 名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 走出唐人街
作 者	高建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8.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14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538-0/I·2703
定 价	14.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 1 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1)
- 2 离首相还差一张信用卡的萨哈琳 (8)
- 3 拯救斯德哥尔摩 (13)
- 4 乌普萨拉——知识神圣的城市 (18)
- 5 彼得堡人 (25)
- 6 永远的雅典 (31)
- 7 霍鲁纳石碑 (37)
- 8 都市森林里的吼声 (43)
- 9 与鸟为邻 (48)
- 10 语言疯狂 (53)
- 11 尴尬的中国胃 (58)
- 12 病在瑞典 (65)
- 13 难得一醉 (70)
- 14 在有酒的日子里 (77)
- 15 唐人街与唐人国 (84)
- 16 流动中的血与水 (87)
- 17 洋媳妇就怎么了? (91)

- 18 中国绘画像什么?..... (94)
- 19 艺术与人的动作痕迹..... (101)
- 20 以棋喻画的意义..... (108)
- 21 仿造的根源..... (119)
- 22 百年之计..... (127)
- 23 “汉学”杂谈..... (135)
- 24 美学之死与美学的复活..... (143)
- 25 文化生产的地方特色与全球化..... (148)
- 26 呼吁“划分”..... (153)
- 27 文艺学的发展与统一..... (158)
- 28 艺术研究呼唤比较的视野..... (160)
- 29 建设中西文论的对话关系..... (165)
- 30 谈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169)
- 31 投身到美的世界——第十三届国际
美学大会..... (174)
- 32 畅饮知识的甘泉——第十四届世界
美学大会..... (193)
- 33 《艺术与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美学》
译者序..... (218)
- 34 与儿子“谈”书..... (221)
- 35 给孩子文学..... (224)
- 36 想起了龙梅和玉荣..... (227)
- 37 告诉孩子人与人是平等的..... (229)
- 38 马路惊魂..... (233)
- 39 我不买车..... (236)

40	唱歌的藏族姑娘	(243)
41	你是第三个女婿	(245)
42	索尔本老师	(248)
43	老 傅	(255)
44	吉星先生	(261)
45	鲍尔父子	(266)
46	涂博士	(270)
	后 记	(274)

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住在斯德哥尔摩时，我曾经无数次地去过帕尔梅墓，独自一人去过，也常带着客人去。每去一次，都有不少感慨。这不是出于对此人的特别崇拜，也不是对他的政绩有多少了解，更不是他在台上时政策的受惠者。我去那里纯粹是观看。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石板，石板下面就静静躺着这位前首相。石板背后是一块未经雕刻打磨的自然形状的石头，上面镌刻着帕尔梅的手书签名，这就算是墓碑了。石板两旁是几株小树和一个金属烛台。他的墓座落在弗里德里克教堂周围的坟墓群之中，与周围的其它坟墓相比，它没有围栏，没有高耸的墓碑，也没有镶金雕饰，是那么朴素、自然。但如果你到那儿去，仍然可以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在这座坟墓前总是有最新鲜的鲜花，总是有不灭的烛光。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十多年来，每天都有人去送花，去续那长明的蜡烛，从未间断过。中国人喜欢说“活在人们的心中”一类的话，这大概能算得上了。

帕尔梅生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曾于 1969 至 1976 年和 1982 至 1986 年间两度任瑞典首相。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重大的是，改议会的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在国际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内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工薪阶层的高税收和高福

利政策。当年,在我们的国家醉心于穷过渡之时,帕尔梅满怀信心地在搞一场富过渡:瑞典模式。



帕尔梅墓前

这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全部包下来的制度。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到六至七百元(折合成人民币)的儿童补贴,并一直领到十六岁,接着再领另一种少年补贴,直到十八岁成年为止。孩子的父母有一年的产假,以后又每年都有专门在家照顾孩子的假期。这样,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母亲就用不着去工作了。中小学学生全免学费、学校发给书籍、练习本甚至在学校写字用的笔,免费供应一顿午餐。一般说来,只要想上大学的人均可申请到上大学的机会。中学考试,特别是高中考试的成绩是大学入学的参考,但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孩子能否进入最想进入的大学或专业学习而已,那些不那么热门的专业的大门,对所有学生都是敞开的。大学里也不用交学费,学生的生活费用学生贷款的办法来解决。凭着大学的学生身份证明,可以申请领到每月五、六千元的贷款。贷款中一小部分不用还,是国家给的助学金,而一大部分在学生毕业后根据收入情况归还。如果到六

十五岁退休时还没有还清,则可一笔勾销。对于失业者,均可领到相当于工作时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失业补助。按照规定,这种失业补助有一定的期限,到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不可以再领了。但这种规定外有另外一些规定,工作介绍所有责任组织失业学习,学习期间照领工资。学习期满后还由国家付工资让学员去专业对口的单位实习,实习期间由国家付工资。因此,如果永远找不到工作的话,是可以永远不发愁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退休后当然有退休金。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补贴,学校的奖助学金,社会上的救济金等。所有这一切福利制度,当然得依赖高额税收,这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让穷人,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也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而让有钱人,处于强势状态的人收入少一点。穷人不会饿着肚子,富人也别想富得流油。

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但即使在动物中间,这个原则的运用也有限度,许多动物群体对本群的动物中的弱者都在保护。在人类社会,这种存在于动物身上的本能性的东西发展成了一些处理社会问题的原则。一方面,强者自然应成为利益获得者,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激励机制。但另一方面,对这种不平等也要有调节,给本群的弱者有生存的机会。有这样一些不同的社会公平观:社会的一部分人会认为,我凭着自己的才能工作,得到一份收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另一部分人则会认为,一种表面上公平的收入掩盖着另一种不公平,歌星、体育明星、超级模特的天文数字的收入,大股东的巨额股息,甚至一项技术发明带来的专利转让费,一本畅销书的稿费,从一个更深的意义上说公平吗?这和他们付出的劳动有比例关系吗?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让一种自然竞争的关系存在于社会之中,对社会快速发展是有利的。不奖励勤奋,形成劳动致富光荣,懒惰贫穷可耻的观念,就不会有进步;但另一方面,会有人争辩说,富的也不等于是勤奋的,而穷的也不必然是懒惰的,听任市场决定不同

类型的劳动的价值而不作任何调节，面对显而易见的不合理状态而束手无策，是人类失落的表现。有人从个人角度看问题，把私有财产看成神圣不可侵犯；有人则从社会的角度看，说明当一部分有钱人一掷千金之时，许多人却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这是人类的堕落，连动物的保护同类中的弱者的精神还不如。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古老的争论，但尽管问题古老，只要没有解决，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两派意见中前者是为富人和强势的人群说话，而后者是为穷人和弱势的人群说话的。帕尔梅属于后者。他没有采取剥夺资本的方法，而把资本家看成是奶牛，一方面养活它，一方面又挤它的奶，为社会造福，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他本人遭遇的灾难是不是由他的政治态度造成的，这当然须等到谋杀案破了以后才能做结论，但在瑞典，许多人都往这方面猜测。

1986年2月的一天，帕尔梅与妻子一道去看电影。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更没有大批记者前呼后拥，甚至连小汽车也没乘。像一个平民，一个普通公务员一样，他们步行去了一家不大的电影院。在瑞典，这很平常。国家小，又崇尚平民化，就常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比方说，你在郊外散步时会偶遇国王，这时，微笑地向他打个招呼即可。一位女副首相常自己开车去托儿所接孩子。她还带着孩子亲自参加“五一”大游行，轮到她上台讲话时，就让孩子躺在讲台后面睡觉。在中国，不仅重要领导人没法做到，连歌星影星也没法做到。过去皇帝可能还会到民间微服私访，今天，电视的普及已经剥夺了任何名人的这个权利。相比之下，瑞典人没那么好奇。帕尔梅虽贵为首相，行动起来也随便得多。多年的平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种领导人对过平常人生活的爱好。其实，谁不想自由地上街走走呢，外国人中国人都一样。中国名人没了这个自由，瑞典名人认为他们有这个自由。然而，就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门口，一个暴徒

冲过来,对着帕尔梅开了几枪。

帕尔梅死了,从此开始了抓凶手的漫长历程。抓到了几个嫌疑犯,后都因证据不足而放掉了,反惹起了嫌疑犯反诉索赔的官司。身材高大的瑞典警察走在街上时威风凛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装备,从手枪、手拷、警棍到报话机、移动电话等等一应俱全,但管得最多的是晚上骑自行车出门必须有车灯,丈夫不准打老婆、打孩子,把在公共场所醉酒闹事者送去醒醒酒。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一把抓住他,但如果你用绳子捆小偷,或是打小偷,那就犯法。偷东西事小,捆人打人事大,有时被偷者罚给偷者一笔钱后偷者还不依不饶,找着警察讨“说法”,警察也依法来找麻烦。但是,有重要的足球比赛时,会临时调集一批英国警察来增援。当然,帕尔梅案是这个国家的一号要案,事关警察局的声誉,警察局也得花大气力。最近听说很快会破案了,但愿这一次证据充足一点。

帕尔梅死后,后继者发誓要继承他的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瑞典自身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东欧的变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

九十年代,高税收逼走了资本家和高收入者,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把公司撤到国外去,一些网球明星申请了外国的国籍。而另一方面,高福利养着许多长期失业却活得很自在的懒人。交税的人走了,吃福利的人还在,这种政策也就越来越难维持。于是,砍福利的呼声四起,整个国家在向右转。

在瑞典的中国人对这种政策一般也持批评态度。在瑞典生活的中国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餐馆的小业主们。这些人不满意高额税收,也无暇去钻研法律,从福利制度中把收去的税捞回来。眼看着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一半交了税,惟一的办法只是做点小手脚,少交一点。但那很有限,而且做起来还提心吊胆。在不断地被拿走一点辛苦钱时,也就不断地培

养和积累一股怨气。还有一类中国人是去留学的留学生们。这批人自认为受过好的教育,有知识、有能力,自己以为可以为这个国家作贡献,结果并不像在有些国家那样得到了对技术移民的优待态度。相反,他们有一种受排挤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从两伊来的难民。原因是,照顾那些难民能提高这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形象,而中国人只是一批来闯世界的人而已,并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政策倾斜。更进一步说,这些留学生既然受过较好的教育,总想占一些好的工作位置,这方面的竞争的失利会加重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这方面的竞争的成功则更使他们相信个人奋斗原则。因此,在那儿的中国人尽管不关心政治,但从总体上来说对右翼政党感到亲近。

九十年代初年的一种全球性的潮流带给瑞典人的是如释重负——一个强大东方邻居的瓦解使他们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但同时,也是一种对理想的威胁——瑞典模式还灵不灵?形形色式的西方政治家们在抨击瑞典模式,形形色式的中国人也在嘲笑它。一时间,历史被宣布终结了,世界上的人们都将按照一种方式生活——不是瑞典那种。但是,那些占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平等、均富、充分受教育的社会之中的理想并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

种种原因造成了对帕尔梅的怀念。瑞典每年的“五一”都举行大游行。在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似乎游行得更有趣味。游行的人在高唱“要为真理而斗争时”,似乎有更深切的内容。老人们怀念他,也怀念存于他们自己心中的理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怀念他,因为他是那些穷国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中少有的知音之一。俄国和东欧的人尊敬他,因为他代表着一种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的新的可能性。于是,与人们预料相反,帕尔梅墓前的花更多了,烛光也更亮了。但这一切对中国人是例外的。那儿的中国人对帕尔梅的政策很陌生。我记得那年电视上播放过苏联冰球队去拜谒帕尔梅墓时

的情景，第二天我还特地去墓上看了看冰球队放在那里的花环。冰球是瑞典人喜爱的运动。那些苏联冰球队员们是瑞典人心目中的明星。他们的拜谒，给瑞典人带来了欢乐和自豪感。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们去帕尔梅墓的消息，其实，这些队员们也是瑞典人心目中的明星。是不是中国离瑞典太远了？康有为周游列国时，并不感到瑞典远。

离首相还差一张信用卡的萨哈琳

克林顿弹劾案尘埃落定，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春节联欢晚会上有演员说，“顺不顺，想想人家克林顿。”博得了人们会心的一笑。小克潇洒的中国之行，给中国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一下子要是他被“弹”下去了，真有点舍不得。事后不少人为美国的那班国会议员们难受，一连几个星期把那一档子事翻来覆去，烦不烦。斯塔尔居心叵测，莱温斯基还算有良心，而琼斯则无耻之尤。大有本来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浪费这么多时间来炒这件事之意。

我在瑞典时，也听说过一件关于莫娜·萨哈琳的事。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萨哈琳的事要比克林顿小得多，但她的运气却没有小克那么好。

莫娜·萨哈琳曾当过瑞典副首相，在瑞典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中是第二号。萨哈琳具有社会宣传和鼓动方面的天才，听瑞典朋友说，她的讲话非常有号召力，在年轻人和妇女中有许多崇拜者。1994年大选前，我家信箱里出现了一封信，是写给我妻子的。她打开一看，信上这样开头：

我给您写信，想谈谈一些我们妇女关心的事。

我的名字您可能听说过，我叫莫娜·萨哈琳……

我们想，她大概是给全国的妇女都寄了一封这样的信。妻子进而发现，萨哈琳和她同岁。从餐厅洗碗工开始，萨哈琳

一步步地在政界奋斗，一直到当上副首相。妻子还觉得萨哈琳的那双睫毛特长的丹凤眼很不一般。人出了名，长相上也可多打几分。总之，我妻子尽管不关心政治，却开始关注新闻媒体上有关萨哈琳的消息。

那一年，中国召开妇女大会，萨哈琳想到中国来参加，但瑞典社会上有人以人权，妇女、儿童的权利，特别是抛弃女婴问题为由表示反对。为了解释她此行的目的，赢得社会上的支持，她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汉字王国》的作者，瑞典汉学家林茜莉的电视谈话。谈话的主题是：互访、对话、交流和沟通有助于推动人权的改善。后来，她克服障碍来到中国，参加会议，还访问了一些幼儿园，中国媒体也有不少报道。可是，她那次来访时，中国媒体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来访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身上。其实，克夫人仅是夫人而已，而萨哈琳则是被选出来的在任副首相。政坛二号人物出访，显然应比一号人物的夫人出访更应受媒体的关注。瑞典是五十年代初就与中国建交，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萨哈琳那次到中国，也是负有在新情况下建立理解和信任的使命而来的。中国的传媒本该给予更多的注意。

中国之行回去后，萨哈琳的政治生涯开始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时期。先是人人都预测，她要当首相了。当时，瑞典的首相是卡尔松，在他的政府里，有一半的部长们是女性，萨哈琳是众女部长之首。在男女平等方面，瑞典的内阁领导着世界的潮流。似乎出现一个女首相的条件已经成熟。

卡尔松也一心一意地扶持萨哈琳。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风波，加上当时的西方经济危机，使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右翼政党上台。到了九四年，在新一轮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终于在卡尔松领导下东山再起。在卡尔松重新担任首相之日起，他就说，他要在国家的各方面情况有所好转时退休，让年轻人接替他的工作。到了九六年，在上台两年后，他感到推出新人的时机已经到来。经济有了好转，政

治形势稳定，离新的大选还有两年时间，可让新首相获得锻炼。于是，他宣布辞去党政职务，并推出萨哈琳当社会民主党新任主席和瑞典新任首相候选人。

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首相的人选只要党内决定就行。卡尔松凭借自己的威望推荐萨哈琳。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其他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都表示不与她争锋，她就成为惟一的候选人。只等召开社会民主党的党代会认可，她就可以在副首相的头衔上去掉“副”字，领导这个国家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出了问题。她的那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那股风风火火搞竞选的劲头，固然有号召力，但把一个国家交给她治理行吗？有不少人在怀疑。当然，仅凭这种怀疑情绪并不能阻挡住当时萨哈琳走向首相宝座的必然趋势。不过，以这种情绪为背景，闹出了点事。

这时，有人揭发，她曾用公务信用卡买过自己的衣服。这件事立刻被新闻界炒作起来。作为国家高级公务员，她有一张公务信用卡，用这张信用卡花钱，将不由她自己的银行帐户付钱，而由公用的银行帐户付钱。作为瑞典的副首相，她的工资大约合人民币六万多元，是普通工人的三倍。由于瑞典税收实行累进制，她必须付出更多的税，因此实际得到的工资也就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两倍。当着副首相，花销大，更由于她不会理财，因此常常不够用，到月底就没钱了。于是，她曾用公务信用卡前后买过几万元的衣服和自己的物品。这也许并不能算是贪污行为。我到最后也没弄清，这笔钱会不会在她的工资中扣除，如果扣，这只能算“挪用公款”一类的错误。我有一位朋友，曾用工作单位的电话机给在中国的家里打过电话。会计发现后，就在他的工资里扣了这笔钱，并在工资表上注明。扣完后没有人当面批评过他，也没有影响单位的人对他的信任。用公家的信用卡买东西，本来与这件事也差不多。当然，有此公用信用卡的人如果都像她这样用信用卡，财务上肯定会有混乱，还是应提出来批评。看来萨哈琳的

工资真不够用。报纸上接着又披露，她孩子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托儿所入托。托儿所的阿姨对记者说，萨哈琳有几次未能按时交纳托儿费。

所有这些，我们看来都是小事。即使说得最严重，说成是贪污的话，贪污了一笔相当于自己一个月工资数的副首相，应该怎么处置？莱温斯基在华盛顿等候作证期间一天的旅馆费是七千美元。一位副首相挪用了的钱也就是这个数而已。问题是究竟有多大？至于晚交了托儿费，更只是说说而已，算不上大错。其实，不仅在我们的观点看来是如此，瑞典人也不是把事情本身看成大事。媒体在强调一个逻辑。如果一个人不能管好自己的财务，我们能指望她管好我们这个国家的财务吗？这就是说，不是这些事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些事说明她缺乏治国的能力。这个逻辑倒是挺有中国味，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这使我想起电视上看到的一个镜头。在有一年的诺贝尔大餐（发奖后的庆祝晚会）上，记者采访一位经济奖获奖者。采访快结束时，记者想幽默一下，问：“您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家里的经济是谁掌管？”经济学家笑了，说：“我妻子管，我管不了钱。”其实也可套用这个逻辑：连自家的钱都管不了，算什么大经济学家？但谁也不会这样提问的。只觉得记者提得机智，经济学家回答得也风趣。不会管家里的钱，丝毫无损于他的经济学家的名声。由此可见，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回事，将之放在一起，对萨哈琳并不公平。就像美国人最后也还是把克林顿修身和治国区分开来一样。但当时她既然确实有错，已形成舆论风向，那位经济学家的故事就无法套用了。

在新闻媒体不断炒作下，她最终被迫辞去她在社民党和政界的一切职务。不但首相没能当上，连原来的副首相职，甚至国会议员职也全部一抹到底。一时间，她灰心失望，在电视上说，她还年轻，也许她会到美国读书去。后来，也不知道

她去了哪儿，只知道有一段时间，电视上看不到她了。

这几年，她又常上电视，进行一些社会政治评论。人们仍然很喜欢她那股政治热情，那种理想主义态度。有一段时间，又有呼声说要让她出来工作，但她说，谢谢，我现在还不想干。从电视上看她的那种神情，显然对几年前把她搞下去的事气不平。其实，当几年观众，看看想想，对她也有好处。她还年轻，过几年还会重振旗鼓。

萨哈琳下了，克林顿没下，都有人说长道短、议论纷纷。他们的上下本身与我们关系都不大，但有一点要明确，我们不应对爱唠叨的媒体，不怕烦的议员有什么反感。他们的工作特性，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注定了他们必须如此，社会也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人。想起一部老电影《创业》上的一句话，“当干部就要有个婆婆嘴！”其实，社会才更需要婆婆嘴，不是听“干部”唠叨，而是对着“干部”唠叨。这几天看电视剧《雍正王朝》，觉得年羹尧该杀，因为他竟杀了直言的孙嘉成，这是比贪污几千万两银子更不可饶恕的大罪。

拯救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她座落在波罗的海之滨，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几百座桥把几个大一点的，靠近陆地的岛连接起来，成为市区。星罗棋布的小岛则撒向大海深处。乘船出海，你会发现这些绿色明珠般的小岛上这儿那儿露出几座红色的小屋，这是一些都市鲁滨逊的家。岛上的人们平常在城里工作，周末和节假日就来此干干园艺活儿。斯德哥尔摩人爱好自然，喜欢骄傲地宣称，这儿可以享受大都市带来的一切优点，但又没有大都市带来的一切弊端。

除了接近自然以外，斯德哥尔摩的另一个美丽之处就是市里的古老建筑。在“老城”(Gamla Stan)，你可以看到壮丽的王宫，有哥特式尖尖屋顶的教堂，有几个世纪前留下的老房子。在“东区”(Östermalm)，有金壁辉煌的皇家剧院，有门前挂着隽秀的古体拉丁文招牌的面包房。再往东去，还可看到云雾背后半隐半现的古堡，那大概是皇家的别墅。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情调，像是在神话中一般。

斯德哥尔摩人不会忘记，这是一场斗争的结果。

本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斯德哥尔摩。当时，有一个被称为“百万工程”的计划，每年要建成10万套现代住宅。在城市郊区，一排排新的火柴盒式的房子拔地而起，一个个新的居民区出现，改善着人们的居住环境。这本是一件